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

ZHONGGUO HONGSHIZI YUNDONG TONGSHI

(1904—2014)

第五卷

总主编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文化

Zhongguo Hongshizi Wenhua

郭进萍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

总主编 池子华

第五卷

中国红十字文化

郭进萍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 中国红十字文化/郭进萍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650-4281-2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红十字会—历史—中国—1904—2014②红十字会—文化—中国—1904—2014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1265 号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 第五卷 中国红十字文化

郭进萍 著

选题策划 钟小要 李克明 朱移山
责任编辑 章建江 鼎
责任印制 郑洁 樊珊珊
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30009)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中心:0551-62903198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176.25
总 字 数 3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650-4281-2
总 定 价 400.00 元(共 6 卷)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第五卷

目 录

第一章 红十字文化走近中国	(001)
第一节 西学东渐：尊西趋新的时代心态	(002)
第二节 中西会通：江南慈善文化传统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兴起	(007)
一、源远流长的慈善文化传统	(007)
二、似曾相识：江南善会善堂与红十字会的融通	(010)
三、有机对接：地方传统的时代更生与红十字运动本土化的实践	(012)
四、一脉相承：江南善人群体和红十字会创建者	(015)
第三节 现实需要：战祸、匪祸、灾荒交织的国情	(018)
第四节 舆论动员：《申报》与中国近代红十字事业的起步	(021)
一、红十字事业起步的可能性——报道在华西人的红十字活动	(022)
二、红十字事业起步的可行性——系统介绍红十字会的相关知识	(023)
三、红十字事业起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多角度宣传红十字会的 利益	(026)
四、《申报》舆论动员的社会影响	(028)

第二章 近代红十字文化的演进轨迹	(033)
第一节 碰撞：异质文化的相遇	(033)
一、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抵牾	(034)
二、对红十字性质的认知偏差	(034)
三、对红十字原则的认知误区	(035)
第二节 本土适应	(037)
一、附会中国传统文化	(037)
二、宣扬功德果报思想	(039)
第三节 剥离转型	(042)
一、与传统慈善事业相剥离	(042)
二、宣扬责任服务理念	(045)
第四节 相互融会	(049)
一、推动传统慈善文化转型	(050)
二、助力红十字文化本土化	(052)
第三章 近代红十字文化的传播	(055)
第一节 媒体传播	(055)
一、印刷媒介：以报纸刊物为考察中心	(055)
二、电子媒介	(066)
三、言语媒介：以演讲为中心	(070)
第二节 仪式传播	(072)
一、纪念活动——以红会周年纪念活动为例	(073)
二、征募运动——以红十字周为个案	(075)
第三节 文娱活动	(082)
一、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	(083)
二、慈善义演	(084)
第四节 范例传播：以红会史上南丁格尔在华形象建构为中心	(086)
一、南丁格尔在红会史上的地位演变	(086)
二、精彩纷呈的传播方式	(089)

三、积极热烈的传播反响	(094)
第四章 近代红十字文化的社会认同	(098)
第一节 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	(098)
一、排拒：与基督教十字架标志相联系	(099)
二、接纳：基于红十字的护身符效应	(101)
三、滥用：基于红十字的光环效应	(104)
四、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多元解读	(111)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募捐的响应	(113)
一、捐助群体的广泛性	(113)
二、捐助动机的多元性	(117)
三、乐善不倦的经纬老人	(120)
第三节 女性群体对红十字事业的参与	(124)
一、报刊对妇女参与红十字事业的舆论引导	(124)
二、女性红十字组织的涌现	(128)
三、女界广泛捐助红十字会	(134)
四、女界积极从事红十字救护事业	(135)
第四节 红十字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142)
一、正向影响因素	(142)
二、负向影响因素	(147)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文化的改造和融入	(157)
第一节 红十字文化的改造	(157)
一、红十字会的改组筹备工作	(157)
二、红十字会角色和职能的重塑	(160)
三、作为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的红十字会	(166)
第二节 红十字文化的融入：以爱国卫生运动为考察中心	(170)
一、爱国卫生运动的发起和动员	(170)
二、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红十字会	(171)
三、爱国卫生运动使“红十字”深入人心	(177)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文化的宣教	(179)
第一节 多样化的宣教方式	(179)
一、红十字刊物和卫生宣传品	(180)
二、展览会	(182)
三、卫生讲座	(184)
四、幻灯、电影放映	(186)
五、实物宣传	(187)
第二节 红十字文化宣教工作的初步探索	(190)
一、宣教工作的重要性	(190)
二、宣教工作的针对性	(191)
三、宣教工作的实效性	(193)
第三节 红十字文化的宣教成效	(196)
一、普及卫生常识,提高民众健康水平	(196)
二、破除封建迷信,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197)
三、加强民众对红十字会的认同,改善党群关系	(198)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红十字文化的新生	(203)
第一节 人道主义回归红十字运动本位	(203)
一、从革命人道主义走向人道主义	(203)
二、从“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到“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 救助团体”	(210)
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14)
四、人道、博爱、奉献成为时代最强音	(217)
第二节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理论研究	(220)
一、理论研究蔚然兴起	(220)
二、红十字会史整理和研究方兴未艾	(222)
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讨论如火如荼	(224)
四、理论研究机构 and 平台 骈兴错出	(231)

第三节 红十字文化的理论探索	(234)
一、红十字文化的重要性	(235)
二、红十字文化的内涵	(237)
三、红十字文化与传统慈善文化	(243)
四、红十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8)
第八章 新时期红十字文化的保护	(251)
第一节 《红十字会法》的出台	(251)
一、《红十字会法》出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51)
二、《红十字会法》的法律保障	(253)
三、《红十字会法》的宣传和普及	(256)
第二节 红十字标志的保护	(259)
一、滥用冒用,层出不穷	(259)
二、建言献策,制止滥用	(264)
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268)
第九章 新时期红十字文化的传播	(281)
第一节 宣传先导	(281)
一、线上线下协同联动:自有宣传阵地	(282)
二、精心组织、全国联动:相约“5·8”	(289)
三、政府承诺、有条不紊:国际人道法传播	(295)
四、精彩纷呈、喜闻乐见:常规文娱宣传	(300)
第二节 品牌感召	(305)
一、品牌:一种文化现象	(305)
二、中山“慈善万人行”:“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一面旗帜”	(306)
三、青岛“微尘”:“一座城市的良心”	(313)
第三节 教育涵化:以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为考察中心	(318)
一、青少年德育和素质教育培养的“第二课堂”	(319)
二、课本中的红十字	(322)
三、“我心中的红十字”	(325)

四、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有声有色	(327)
第四节 传播工作省思与瞻望	(332)
一、传播工作成效及制约因素	(333)
二、“工作是最好的宣传”	(335)
三、构建理论、传播双轮驱动的新格局	(337)
余论：红十字文化本土化刍议	(339)
一、推进红十字文化本土化的必要性	(340)
二、推进红十字文化本土化的路径	(341)
主要参考文献	(346)

第一章 红十字文化走近中国

红十字文化是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逐渐形成、发展的。说到红十字文化的创生，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功不可没。红十字文化的人道主义特点，首先与亨利·杜南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1828年5月8日，亨利·杜南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法国传教士后裔。杜南从小生长在一个宗教氛围浓郁且富有爱心的家庭。其父雅克·杜南，在1827年结婚之前边从事商业活动，边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兼任法院监护机构的督导员，管理并帮助穷苦的孤寡老人、弃儿和一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杜南的母亲安冬丽特·柯莱东出身名门，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都奉献在慈善活动中。这种家庭环境，造就了杜南善良慈悲的品格。杜南8岁时和父母一起去劳改所参观，那里有一些服刑的犯人。他看到犯人遭虐待的情景，十分愤懑，当时就发誓：“长大了，我要写一本书，反对这种极不公正的社会行为。”^①人道主义的种子，在幼年时期的杜南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1859年6月25日，31岁的杜南在意大利商业旅行途中，目睹了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两军殊死搏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场面，由此萌发了防止在未来战争中造成这种痛苦或改善这种状况的思想——建立伤兵救护组织，“人性和文明急切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兵救护组织”^②。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

^① [瑞士] 马克·德斯贡伯：《亨利·杜南传》（苏兰媛、王庆桐译），《中国红十字报》1992年1月3日。

^② [瑞士] 亨利·杜南：《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①，实施有效的救护。战争结束后，杜南开始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通过对那场血淋淋战争细节的真实描写来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进而呼吁“以批准一项不可侵犯的公约的形式来确立一些国际准则”，一旦公约得到同意和批准，“就可以成为欧洲各国伤兵救护协会成立的依据”^②，保障人道主义的实施。

在杜南的奔走呼吁下，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标志着红十字会的诞生。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了红十字会特殊的中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公约的签署，如杜南所称，是“伟大的外交创举，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新的战旗”^③。由此红十字运动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红十字文化也如燎原之火迅速传播开来。而中国，在门户洞开、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红十字的“准入”也是大势所趋。

第一节 西学东渐：尊西趋新的时代心态

红十字文化作为舶来品，何以东渐并成功在中国登陆？这与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风向密不可分。一般而言，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吸收都是在本国文化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时才会发生。以日本为例，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每当崇外主义占优势时，就出现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吸收期”。相反，当鄙外主义占上风时，就会出现对外来文化的“冷漠抵触期”^④。这一点对中国而言也是适用的。红十字文化登陆中国，即是在西学冲击、国人文化自卑的境况下趁势而入的。

由于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人向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优越感，轻易不向他种文化“低头”。鸦片战争以后，国人眼界大开，开始“睁眼看世界”。随着欧风美雨的浸灌和中国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

① [瑞士]亨利·杜南：《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② 参见[瑞士]亨利·杜南：《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③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 参见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失败，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在器物、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上的优越性，颂扬西方政教文化者日渐增多。从中国对西方称呼由 19 世纪 60 年代前的“夷务”，到七八十年代改称“洋务”和“西学”，再到 20 世纪初普遍称西方为“泰西”的变化过程看，也明显体现出中国社会尊西趋新的时代潮流。

1891 年，康有为已发现，当时读书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戊戌维新前后，更出现极富想象力的“进种改良”或“合种通教”之说，即通过整体的黄白通婚一次性地实现中西“合种”，从人种上“化为西人”。后来从梁启超到《国粹学报》之人，也至少都向往过中西“两大文明结婚”，觊觎着文化上的“合种通教”^①。更有甚者，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20 世纪以来由西方学界倡导，中国新派学者信仰提倡之中国文化西源说也蔚为风行^②。到 1904 年，邓实回顾这段西力东侵的历程时说：由于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屡失利，“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谓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而求西学。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③。邓实那段时间基本活动在上海，耳濡目染着中国最为尊西的风尚，因此他的言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尊西趋新的时代心态下，各种西学（包含西方的人道、博爱理念）纷纷涌入中国。据笔者粗略统计（见表 1-1），1884—1910 年间各类报刊对人道的探讨相当热烈。

表 1-1 1884—1910 年部分报刊刊载宣传西方人道学说文章统计表

年份	篇名	来源
1884	人道辨	《益闻录》第 345 期，145—146 页
1898	人伦说	《蜀学报》第 2 期，20—22 页
1900	时论译录：欧洲列国与人道（译日本报）	《清议报》第 59 期，3765—3768 页
	瀛海纵谈：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	《清议报》第 66 期，4185 页
	时论译录：西洋人与人道	《清议报》第 67 期，4251—4253 页

① 罗志田：《学无常师》（上），《读书》2010 年第 6 期。

② 详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67 页。

③ 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1904 年 3 月 31 日。转引自罗志田：《学无常师》（上），《读书》2010 年第 6 期。

(续表)

年份	篇名	来源
1903	杂录：记人道教育会	《大陆报》第5期，5—8页
	杂评：人道与人道之贼	《新民丛报》第33期，74—75页
1904	来稿丛录：人道论	《万国公报》第190期，38—40页； 第191期，32—35页
1905	外稿：人道论	《万国公报》第193期，44—46页
1907	人道纲目读法	《竞立社小说月报》第1期，1—2页
	人道纲目卷一	《竞立社小说月报》第1期，1—30页
	人道纲目：凡例八则	《竞立社小说月报》第1期，2—4页
	人道纲目一	《竞立社小说月报》第2期，31—56页
1908	“人道”报言支那革命	《新世纪》第34期，1页
1910	无人道之惨杀世界	《大同报》第14卷第4期，4—9页
	来稿：无人道之惨杀世界	《广益丛报》第239期，1—3页
	国内紧要新闻：劳乃宣反对刑律用人道进化主义	《大同报》第14卷第4期，27页

近代中国对人道主义纷繁复杂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人对人道主义的认知，为红十字人道主义的顺利传播做了初步奠基。与此同时，西方的博爱理念也伴随着传教士的涌入而在中华大地广为传播。1837—1910年，各类报刊对西方的博爱也有诸多介绍（如表1-2所统计）。这样，人们接触以人道博爱为宗旨的红十字文化时就显得不那么陌生，甚或有几分好感了。

表1-2 1837—1910年部分报刊刊载宣传西方博爱学说文章统计表

年份	篇名	来源
1837	博爱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05下—206上页
1878	公报弁言：且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万国公报》第502期，2页
1903	闽峤琐闻：泉州：欧人博爱	《鹭江报》第37期，3页

(续表)

年份	篇名	来源
1906	说博爱的益处	《敝帚千金》第11期, 19—20页
1907	博爱主义实行家墨德女士传	《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 1—10页
1910	博爱主义	《南报》第3期, 1—5页

伴随尊西趋新的时代潮流, 西医在与中医的竞争中也以优势胜出。值得一提的是, 红十字文化传播伴随着西方先进医疗技术的输入, 故而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与西医在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人对西医的优越性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有“上医医国”之说, 并认为“西医之法将大行于中国”^①。基于此, 有学者指出: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与医疗界对西方文化及其医学的认识逐渐加深并日益客观公正的进程中, 西医已经成为舆论界公认的优越于中医的医疗技术和手段, 与西医联系密切的红十字会医疗技术也获得当时中国社会的赞赏, 只要遇到战争的因缘, 纯西方式的红十字慈善医疗组织在中国的设立也就水到渠成。”^②

与此同时, 一批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在华西人在传教布道和济世救人的多重动机下在中国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了学校、医院、孤儿院、育婴堂等诸多慈善事业, 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中国慈善救济理念的近代化。在西学的全方位渗透下, 中国社会的关注热点也开始向西方的慈善领域转移。从19世纪70年代起, 舆论界要求积极“仿行西法”, 以西方慈善理念和办理模式为参照, 改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据统计, 1872—1895年, 仅《申报》就发表学习西方慈善事业的文章共计18篇(见表1-3)。

表1-3 1872—1895年《申报》刊载宣传、鼓励学习西方慈善事业文章统计表

时间	题名	年份数量
1872. 12. 20	西教为劝善之教	1872年1篇
1878. 6. 22	论西人助赈中国并无他意	1878年1篇
1879. 7. 5	中国宜设疯狂院说	1879年1篇
1880. 10. 7	论西法切于民生	1880年1篇

① 《医国篇》,《申报》1888年9月29日;《论西医将行于中国》,《申报》1887年9月14日。

② 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67页。

(续表)

时 间	题 名	年份数量
1889. 3. 1	论聋瞽哑学塾	1889 年 3 篇
1889. 3. 5	论西人能为其难	
1889. 3. 6	论西人赈捐有法	
1891. 7. 31	论栖养流民宜参用西法	1891 年 2 篇
1891. 9. 27	论取法西人未可厚非	
1893. 9. 3	善堂宜仿西法以臻美善论	1893 年 5 篇
1893. 9. 17	推广善堂宜仿西法论	
1893. 10. 23	论泰西善举之善	
1893. 11. 13	论善堂仿西法之利	
1893. 12. 17	论泰西善举之有益	
1895. 3. 4	论行善举宜取法于泰西	1895 年 4 篇
1895. 9. 30	宜在上海倡设众善堂	
1895. 11. 16	论创设疯人院以救疯人之苦	
1895. 12. 3	述客言中国宜广设医院	
合 计		18 篇

资料来源：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0—171 页。

由表 1-3 可见，在整个 70 年代，《申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仅有 3 篇，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申报》对西方慈善事业的探讨则颇为集中。1889—1893 年，共计 10 篇，再加上 1895 年则有 14 篇。可以说，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适于西方慈善组织生存的良好舆论环境。在 1904 年，甚至有人将慈善事业提到救国的高度，大声倡议：“慈善事业之不可一日辍于天下，是固理论家之所同认者也，而施之于中国为尤切。欲救今日之中国，必自改良风俗始，必自增进民德始，必自联合人群始，而是数者，皆非以慈善事业诱掖而将助之，则终无以立其基础。”^①

在—批早期出洋考察的学人、士绅和官员等思想先驱的鼓吹与倡导下，近代中国慈善救济思想吸收了西方国家的济贫思想和实践经验，被赋予了新

^① 《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东方杂志》1904 年第 1 卷第 11 期，第 262 页。

的内涵与特征。主要表现在：(1) 慈善与救济的内容与对象有所更新和扩大，加进了慈善教育和慈善医疗的内容；救济对象也有所扩大，不仅仅限于对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具有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动的特征。(2) 树立了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3) 赋慈善救济于发展经济中^①。由此可见，“通过西方人士在华几十年的具体办善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内部对西方慈善诸问题的辩难、争论，至少是在社会的上层人士中间已经达成了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慈救理念和办理模式的共识，并且这种认识上的需要日益迫切”^②。这就为此时红十字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节 中西会通：江南慈善文化传统 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兴起

红十字文化东渐登陆中国并得以成功“着陆”，是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说西学冲击是外力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积淀则为红十字文化的落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作为“舶来品”的红十字会，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是首先在江南^③落地生根，这与江南社会所特有的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一、源远流长的慈善文化传统

江南慈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至晚从宋代开始，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作为繁荣富庶之地，就在各种善举的兴办方面颇有声色，并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机构设置早；二是设施种类多、济助对象广；三是机构规

① 任云兰：《西方慈善救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分析》，《天津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 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③ 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中外学者如李伯重、陈忠平、樊树志、范金民、包伟民、徐茂明、黄宗智、森正夫、滨岛敦俊等都有过探讨，但尚未达成共识。本书拟采用李伯重的观点，他指出，对江南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模大、设施全；四是出现了民间慈善活动^①。宋初名臣范仲淹在苏州创办范氏义庄，以义田所得资助同族衣食及婚嫁丧葬用度，这一做法受到广泛的称道和效仿。据清人记载：“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②至明清时代，江南地区民间慈善活动的兴盛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且江南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全国范围内善会善堂最为发达的地区（见表1-4）。

表1-4 明清时代江南善堂的地区性数量分布表

数量及占比 类别	苏（占全省%）	浙（占全省%）	苏+浙	全 国	两省数 占全国%
育婴堂（所）	182（18.78）	131（36.69）	313	973	32.17
普济堂	27（2.79）	9（2.45）	36	399	9.02
施棺局	255（26.32）	87（23.71）	342	589	58.06
清节堂	105（10.84）	27（7.36）	132	216	61.11
栖流所	16（1.65）	18（4.90）	34	331	10.27
综合	131（13.52）	14（3.81）	145	338	42.90
其他	253（26.11）	81（22.07）	334	743	44.95

资料来源：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江南好善之风盛行，素有“东南好义之名称天下”^③之美誉。这种善风在苏州、上海等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冯桂芬指出的：“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惟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④

苏州是民间慈善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史料载：“吾苏好善之多也，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与抑上之人之为倡率，俾之得行其志，而益劝于为善也。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缕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饷月给，旁建惜字、

①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四《公署四》，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总第582页）。

③ 刘宗志：《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三《上海果育堂记》，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0页（总第361页）。